

鐵水流向何處？

——評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

● 周 俊



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

近年，香港出版了多部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重要學術著作^①。其中，黃道炫的《鐵水

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以下簡稱《鐵水流》，引用只註頁碼）聚焦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新生蛻變之歷程，在廣泛運用檔案、日記、回憶錄等各類不同性質史料的基礎上，剖析了中共獨特的政治文化與組織運作系統，在海內外學界頗受關注。黃道炫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近年致力於將心靈史之微觀視角與系統分析之宏觀視角相結合的史學新方法，可謂獨樹一幟。

因作者對國共兩黨的革命史均有深厚的研究積累^②，所以《鐵水流》的分析重心雖然在中共方面，但對作為「孿生兒」的國民黨亦有所關照。不僅如此，本書還將中國地方社會的政治菁英、普通民眾的中下層視角，以及美國、日本等國際視角，巧妙地融入以中共為主線的敘事框架之中，抗戰史也因而變得更為立體、生動。

從內容上而言，本書分為「戰時中共的規訓系統」、「戰時中共的

黃道炫的《鐵水流》聚焦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新生蛻變之歷程，在廣泛運用檔案、日記、回憶錄等各類不同性質史料的基礎上，剖析了中共獨特的政治文化與組織運作系統。

規訓系統之所以能在極為苛刻的條件下仍行之有效，使所有人衷心服從黨的意志，不僅僅是因為中共擁有一套極為細緻的、系統性的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大多數知識份子有一種自下而上的自覺認同和接受意願。

政策和貫徹系統」、「戰時中共的生存和抵抗」三個部分，由十一篇已發表的學術論文統合而成。然而，本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結構鬆散的論文集，而是將問題意識一以貫之、形散而神不散的學術專著。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述，抗戰時期的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極為重視方法論意義上的「系統」，並且客觀地看，規訓、貫徹、抵抗三個子系統確實也相互關聯，進一步構成更大的革命系統（〈引言〉，頁 xvi-xx）。下文將述評全書的概要，並提出若干值得探討的疑問，以便拋磚引玉。

一 規訓系統

根據中共自身的黨員人數統計，在中共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進行戰略轉移（即長征）的1934年，約有黨員41萬人。隨後，革命勢力步入低谷，在抗戰爆發之初的1937年，黨員人數已銳減至4萬人。然而，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之時，也就是抗戰結束的前夕，黨員人數卻猛增至120萬人^③。僅從黨員人數的增長情況便可清楚地了解，中共正是在抗戰中浴火重生。為了增強組織的紀律性與凝聚力，將眾多黨員幹部，特別是抗戰之初大量投奔延安的知識份子（即「三八幹部」）塑造成真正具有黨性的黨員，中共展開了持續性的教育、改造、懲戒甚至清洗。這一系列行為，本書稱之為「規訓系統」。

為了探討規訓系統的具體運作與歷史內涵，在第一部分，作者截取了訓練改造（第一章「幹部養成的

路徑」）、婚戀政策（第二章「婚姻限制下的掙扎與皈依」）以及整風運動（第三章「整風運動的心靈史」）這三個歷史斷面，對黨員幹部的內心世界進行了「透視」般的觀察。

如作者所言，「中國歷史上，大概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整風這樣，予書寫以如此高的重視」（頁116）。無論是反省材料還是筆記，甚至包括足以決定個人政治生命的調查記錄，不僅會作為個人檔案保存於人事部門，其書寫過程亦是訓練改造黨員幹部的重要方法。在筆者看來，這種取法蘇聯的個人信息管控模式似乎對中共的規訓系統有着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值得更深入地分析其具體形成過程以及在規訓系統中的應用案例。

本書關於規訓系統的實證分析可謂洞察入微，應是全書最出彩的部分。在這一部分的分析中，作者大膽突破了「權力鬥爭」、「左與右」、「加害與被害」等既往的分析框架，將歷史的話筒交還給一個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在作者看來，規



中共一大會址（資料圖片）

訓系統之所以能在極為苛刻的條件下仍行之有效，使所有人衷心服從黨的意志，不僅僅是因為中共擁有一套極為細緻的、系統性的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大多數知識份子有一種自下而上的自覺認同和接受意願。其時代背景是「中國社會思想中長期沒有獨立存在的個體」以及「急迫的生存危機尤其讓民族自覺日漸強烈的國人需要可以凝聚的力量」，「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追求大我、放逐小我不僅僅是共產主義者的要求，幾乎也是那個時代多數人的心聲，毋寧說，組織的凸顯倒給了憂患時代的人們安頓自己身心的處所」（頁143）。從歷史的結果來看，這一分析顯然有很強的說服力。不過，我們也可以反問，憂患時代的人們為甚麼不會（或者會）將自己身心寄託於當時更具合法性的國民黨？

另外，筆者對書中關於規訓方法的如下分析也頗感興趣，即「共產主義當然不能和宗教簡單類比，但追求理想、強調獻身和犧牲有某種形式上的相似性」。這似乎是一種帶有暗示性的曲筆。順帶一提，作者在此處徵引的、曾任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李立三的〈共產黨與宗教〉（1936）一文，是筆者未曾耳聞的文獻，其中提到共產黨不排斥「一切宗教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精神」（頁101）。翻閱《鐵水流》便可了解，作者非常善於發現和運用隱藏在縫隙中的史料「碎片」，此為一例而已。

作者運用史料的能力在第二章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中對於黨員幹部心理世界的刻畫尤其入木

三分。眾所周知，婚戀自由和女性解放是中共革命的奮鬥目標之一。然而，這一革命理念與實踐卻不無衝突之處。日本學者高橋伸夫通過1920至30年代鄂豫皖蘇區、閩西蘇區的個案分析發現，婚戀自由的理念在蘇區內曾引發兩性關係的混亂，不僅導致很多黨員幹部革命意志衰退，更使得性病、棄嬰、情殺等社會問題呈蔓延之勢^④。

從此意義上而言，延安時期中共的婚戀限制政策既有黨權大肆擴張的一面，也有戰時環境下不得不如此的苦衷。當然，無論大多數知識份子主動抑或被動地接受這一嚴苛的政策，都不應忽視歷史中的人們遭受過的巨大痛苦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正如書中所描述，「從中共幹部的日記中不難看到因為愛和性無法得到滿足的苦惱」（頁80）；「長期缺乏異性的環境，還可能影響到性取向」，軍隊中還因此發生過雞姦的問題（頁82）。甚至有人提出質疑，「某浪漫女星也曾上海被捕，不過二三月即出，所表現得能很好？上海那段生活能光榮？但能夠滿足某要人之特欲即成珍品」（頁86）。儘管作者沒有明言，但此處的「某浪漫女星」可以推測是江青，而「某要人」則指的是毛澤東。顯然，根據年齡、資歷、級別嚴格限制婚戀的政策，也可能對黨內凝聚力造成負面影響。

談及毛澤東的權威，讀者可能會聯想到毛通過延安整風，從黨的領袖之一躍成為黨的最高領袖這一史實。正如康生在1944年指出的那樣，「如果不是搞了整風運動，毛澤東幾乎不敢來中央黨校作報

作者認為通過整風，「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領袖地位和形象的構建」。然而，趙諾的新作發現，在太行根據地，不僅整風的領導者很少直接讚頌毛澤東，被整風的知識份子在日記中也幾乎沒有提及毛。

作者的觀點提醒我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中共脫胎自蘇聯而又不同於蘇聯的個性形成，不僅僅取決於高層政治中毛澤東與留蘇派之間的爭鬥，還體現在不斷被調試、摸索的基層政治實踐當中。

告」^⑤。作者同樣認為，通過整風，「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領袖地位和形象的構建」（頁149）。從高層政治的角度而言，這個觀點恐怕不會有太多異議。然而，趙諾的新作《太行山上：中國共產黨太行根據地幹部政治成長史》對這一觀點作了補充與修正。由於整風的學習文件中毛的著述比例最高，因此人們往往認為整風的核心就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對毛的個人崇拜亦始於此。但趙諾發現，在太行根據地，不僅整風的領導者很少直接讚頌毛，被整風的知識份子日記中也幾乎沒有提及毛^⑥。可見多層次、多視角的整風運動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 貫徹系統

規訓系統雖然塑造了一批強有力的黨員幹部，但並不等於中共的政策貫徹就會一帆風順。在第二部分，作者分章闡釋抗戰時期的中共通過四種路徑，最終實現了政策貫徹的系統化，獲得相較於一般共產主義政黨更具彈性的運作機制：第一，以建立鞏固的鄉村基層政權為主要目標的垂直式權力下探；第二，尋求組織扁平化，並增強政治彈性的群眾路線；第三，政策從理論到實踐的落實機制；第四，使組織的適應力、滲透力迅速提升的統一戰線。作者的觀點提醒我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中共脫胎自蘇聯而又不同於蘇聯的個性形成，不僅僅取決於高層政治中毛澤東與留蘇派之間的爭鬥，還體現在

不斷被調試、摸索的基層政治實踐當中。

垂直式權力下探，即中共扎根鄉村社會的成敗要因，可以說是革命史研究的經典命題之一。在第四章「權力的垂直下探」，作者將目光投向中共幹部的社會文化屬性，並提出區村級基層幹部實際上大部分是「具有社會經驗和知識文化的鄉村能人」（頁163）。這一論點與本書第一部分中共從「土包子」形象走向知識化的分析相互呼應（頁56-64）。在作者看來，知識和專業水平都不低的黨員幹部群體不僅是權力下探的重要前提條件，更是後世學者重新審視中共革命的要點。

不過，日本學者丸田孝志根據抗戰時期華北地區近萬人的樣本數據，得出過不同結論。其整理的數據顯示，1943年冀魯豫軍區16,981名中共黨員中，農民佔85.5%，學生和商人僅佔9.3%。1943年冀魯豫3,539名縣、區、村級幹部的分層統計結果顯示，位於組織末端的2,551名村級幹部中，農民比例高達81.3%，不識字的文盲則佔52.4%^⑦。換言之，作者所謂「鄉村能人」佔優勢的情況，應該只出現在區縣級幹部群體中，而不是真正的村基層。另外，李里峰通過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分析發現，知識份子佔較高比例的情況主要發生在政府系統，而黨務系統還是農民出身的幹部佔絕大多數^⑧。顯然，關於如何定位「鄉村能人」，似乎還有討論的餘地。

在第五章「群眾組織及群眾路線」，作者另闢蹊徑，不僅對群眾路線的尷尬處境（中共既是垂直權

力體系裏「自上而下的統治者」，又是「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扁平化結構」裏「民眾利益的代表」)之由來做了梳理，還細心地注意到中共高層在這一問題上的巧妙解釋，即權力體系作為「硬的組織」，群眾路線代表「軟的文化」。同時，作者還分析了群眾路線這一政治理念與蘇聯的相似性，並指出「〔中共〕群眾路線的提出，有着深遠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淵源」，如斯大林也強調共產黨須同時扮演教育群眾和向群眾學習的角色(頁208-16)。實際上，將中共的革命系統置於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脈絡之下進行關聯性的探討亦是本書的一大特點，書中多處提及蘇聯對中共的政治文化以及各種工作方法所產生的影響，這體現了作者廣闊的國際視野與深厚的史學底蘊。

第六章「政策落實」對檢查與會議、中心突擊與勞動競賽、數目字管理與調查研究、軟硬兼施的動員工作串聯而成的政策落實機制進行了梳理。第七章「統一戰線的地方形態」則重點分析了中共的地方組織如何經營自身的政治環境。其中，關於開會與動員的分析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作者看來，「中共的貫徹之所以不流於走過場，和開會這樣的現場形式關係極大」，「學習—報告—檢討—總結」的會議模式起到政令上傳下達的效果(頁236、238-39)。因此，過多的會議雖然惹來不少反感，但依舊是中共最重要的工作方式。關於動員問題，作者認為，「中共的動員話語常常介於說服、勸導和要求、命令之間」，「由於強制總是比動員

更有效率，具體貫徹時常常會凌駕於動員之上」(頁255)，可謂一語中的。

關於戰時中共的組織效能、政策貫徹問題，李里峰和齊小林的實證研究亦引人矚目。遺憾的是，本書並未提及這兩位學者的重要成果^⑨。縱觀全書，作者似乎有些「獨行俠」的風格，並沒有積極與先行研究展開對話。筆者無意在學術規範性問題上吹毛求疵，而是認為學術對話不僅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有助於讀者更清晰地掌握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脈絡。

三 抵抗系統

《鐵水流》的第三部分意在考察中共在華北日佔區(即敵後戰場)生存和抵抗之實態，以此觀測規劃系統與貫徹系統在戰爭中的實際運用效果。從方法論上而言，如果說本書的第一部分偏重於心靈史，第二部分偏重於政治史，那麼第三部分則更傾向於軍事史的分析。中國大陸的抗戰史研究一直存在着重宏觀政策、輕戰史細節，重議論、輕實證的頑疾^⑩。其中，既存在大陸學者收集、解讀日文史料的能力、動力不足的問題，也有學術思路容易墨守成規的因素。相反，日本及台灣學者在實證性的軍事史分析上開風氣之先，積累了豐碩的學術成果^⑪。但是，由於問題意識不同，且大陸的史料公開相對受限，日台學者主要關注抗戰中日本或國民黨的動向，對中共的研究稍顯不足。從此意義上而言，本書第三部分填

將中共的革命系統置於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脈絡之下進行關聯性的探討亦是本書的一大特點，書中多處提及蘇聯對中共的政治文化以及各種工作方法所產生的影響，這體現了作者廣闊的國際視野與深厚的史學底蘊。

作者分析了敵後戰場中共與日軍之間的弱平衡現象。中共與日軍的對峙，雖然綜合實力一強一弱，但雙方都擁有非對稱優勢。中共能夠在敵後扎根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抵抗。

補了這一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第八章「出師華北」，作者首先考察了中共在敵後的生存環境，即華北日佔區的政治與社會生態。華北地區的國民黨中央勢力薄弱，以及紅槍會、聯莊會等地方自衛武裝力量發達等環境因素，對中共的生存發展有利有弊。總體而言，中共巧妙地利用環境因素，促進了自身的發展。同時，作者還討論了中共的財政問題，認為國民黨提供的豐厚軍餉、蘇聯的巨額資金援助、海內外的捐款確保了中共在抗戰初期（1937-1941）能夠不為資金問題所困擾。對於1941年以後中共的財政問題，本書有些語焉不詳，只提及國民黨和蘇聯停止財政支持後的財政混亂和開源節流。而鴉片貿易在這一時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至少在海外學界已是共識^⑩。

第九章「持久戰的『三駕馬車』」主要從平原游擊戰、根據地建設、正規軍運動戰三個維度分析了中共在敵後的作戰形態，作者認為中共的黨政軍民總體戰之輪廓亦來源於此。同時，作者還提及了抗戰初期中共高層關於游擊戰的爭論，頗令人玩味。據作者分析，儘管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游擊戰的重要性，但作為妥協，也同意在有利的條件下打運動戰。結果，「中共試探性進入華北平原的小股武裝力量卻出現出人意料的發展局面，如火如荼的華北平原大發展，給了中共空前的機會」（頁345），再加上「山東完全靠地方黨自身就發展成軍的事實，更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感覺到在平原地區堅持和發展游擊戰的可

能」（頁350）。以上的分析實際上凸顯了歷史發展的不可預測性。換言之，毛在軍事指揮上雖然善於隨機應變、殺伐決斷，但在戰略上並非像傳統黨史描述的那般未卜先知。儘管如此，作者還是對毛的軍事才能給予了極高評價，認為「毛澤東的解釋有戰略上的前瞻性」（頁366），「對戰爭的複雜性、多因素特徵如數家珍，總體戰對他而言不是太大的理論難題」（頁371）。不過，楊奎松在一篇主題相近的論文中，對毛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軍事戰略家形象進行了相對化的解讀，認為毛在敵後游擊戰的問題上，既有善於學習、變化的一面，又有焦慮、知識不足的一面^⑪。

在第十章「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作者分析了敵後戰場中共與日軍之間的弱平衡現象。本書將「弱平衡」現象定義為，「強勢的一方似乎足以打破平衡，卻又沒有足夠決心打破平衡，不得不無奈接受，雙方間的平衡搖搖欲墜，卻總能維持不倒」（頁384）。簡言之，中共與日軍的對峙，雖然綜合實力一強一弱，但雙方都擁有非對稱優勢，所以日軍只能在「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中告捷，卻長期陷入「鄉村、小路的相持戰」的沼澤裏（頁385）。作者多次強調中共的堅韌與頑強，並駁斥了批評中共游擊隊「游而不擊」的觀點。在作者看來，中共能夠在敵後扎根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抵抗。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但更令人好奇的問題可能是，中共的敵後武裝對日軍、偽軍、國民黨的戰鬥分別取得了怎樣的具體戰果。

第十一章「抵抗系統的隱喻：地道和地道鬥爭」也頗為有趣。在此章中，作者對時常出現在「抗日神劇」中的地道戰作了嚴肅的學術分析。抗戰結束前，冀中平原的地下大約有數萬里的地道，儼然一個大型地下迷宮（頁440-41），實在令人感到驚歎。正如作者所言，中共起起落落的地道戰正是其頑強扎根敵後的象徵，「縱橫於冀中地下的地道，某種程度就是戰時中共抵抗系統的隱喻」（頁452）。令筆者感興趣的是，這些大量的地道作為一種奇特的戰爭遺產，在戰後或者說在中共建國以後有着怎樣的故事？

四 若干疑問

對中共而言，抗日戰爭可謂機會與危機並存。在此環境下，中共為何能夠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在此過程中，中共如何形塑屬於自己的政治文化與組織運作系統？圍繞這一問題意識，《鐵水流》運用豐富的史料，時而對黨員幹部的個人內心世界進行超近距離的特寫，時而又切換至國民黨、日本、美國的視角對中共進行全景式的觀察，讀來令人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實是一部上乘的學術佳作。

然而，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亦有一些困惑不解之處。第一，心靈史的分析應該如何處理複雜性和流動性的問題？談及整風運動的心靈史，顯然無法繞開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⑭。儘管存在諸多批

評意見，但筆者依舊認為該書是中共整風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在該書的敘事中，整風心靈史的主線是壓力、不安以及暴力、恐懼，所謂「向黨組織交心」很大程度上是黨員幹部為了尋求解脫的無奈之舉。《鐵水流》雖然也同樣談及了外力強制的情況，但分析的重點卻在個人的思想自覺。作者認為，「內的自覺是基礎，外的規訓是手段」（頁70），「向着黨成為唯一頭腦的目標邁進時，當年的中共黨人並不一定像後人想像的那樣充滿痛苦和掙扎」（頁141），「現實中更大的可能則是他們如何說服自己，從有條件信任到無條件獻身，當這個過程趨向於實現時，甚至常常會生出鳳凰涅槃的感覺」（頁142）。

在整風運動中，思想自覺和暴力恐怖實際上是硬幣的兩面，重視哪一面，自然因人而異。從《鐵水流》選取的日記史料來看，不是不能自圓其說，但問題在於，作者所引的日記幾乎都是摘自不同的個人在各個時間點上的思想斷面，實際上很難準確觀測同一行為主體在一個時間線上的思想掙扎過程。而前文提及的趙諾《太行山上》通過分析《溫村日記》，對一名普通知識份子幹部在軟硬兼施的整風運動中從內心糾結到無力掙扎的心路歷程作了精彩分析，可以作為參考對照。這本日記雖然只有一個月的內容，但日記主人當時正在河北涉縣溫村參加整風學習，因此可以說是觀察心靈史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個案材料。通過《溫村日記》可以了解，普通知識份子幹部在積極和消極之間不斷徘徊、掙扎，最終向黨組織

從《鐵水流》選取的史料來看，作者所引的日記幾乎都是摘自不同的個人在各個時間點上的思想斷面，很難準確觀測整風運動中同一行為主體在一個時間線上的思想掙扎過程。

蕭軍日記帶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有未受到出版審查、時間跨度長且具有連續性等優點。更為重要的是，這套日記透露的信息與《鐵水流》的一些基本觀點相左，讓其缺席實在令人感到可惜。

進行精緻的、迎合式的，有時甚至是自殘自虐式的忠誠宣誓^⑮。

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政治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指摘，「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想主體不是忠誠的納粹或虔誠的共產黨員，而是無法區分事實與虛構的人」^⑯。換言之，黨員幹部在整風中經過徘徊、掙扎，最終選擇放棄自我但又似懂非懂的模糊狀態，雖然並不符合黨對整風的最初設想，但卻有可能在結果上以一種意外的方式強化了組織的紀律性與凝聚力。

第二，如何解釋相互矛盾的史料？或者說如何讓相互矛盾的史料進行對話？關於日記、回憶錄等個人性質的史料，本書不僅提及日記會被審查乃至公開傳閱(頁98)，同時還指出日記存在刻意表態的可能性(頁6、143)；作者甚至曾專門撰文強調歷史學者應當注意傾聽失聲者的聲音^⑰。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可以稱得上是「日記專家」的作者卻對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棄而不用，僅在討論鄉村政治生態時引用過一次(頁176)。

考慮到蕭軍桀驁不馴的個性，以及其在延安所處的獨特位置，他的日記難免帶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對而言，蕭軍日記也有未受到出版審查、時間跨度長且具有連續性等優點。更為重要的是，這套日記透露的信息與《鐵水流》的一些基本觀點相左。例如蕭軍在日記中寫道，「高級的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地位等優越條件，對同志的女人實行引誘」；「整風運動在延安還像樣，外邊就馬馬虎虎了……無計劃，無方針，不能貫徹始終」；「如今每個

知識份子幾乎全在度着心靈的煉獄的生活」；「這裏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只感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這鄉上的幹部……幾乎全是流氓成份，鬼鬼祟祟，全無正氣」；「毛底本人是感覺性的人，他是聰敏的，但缺乏一種深沉的思維力，和預見的眼光。他自己對一切事物的思維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⑱。以上的記載並不是歷史的完整再現，而是蕭軍作為當事人的近距離觀察和主觀體驗。筆者不認為蕭軍日記的內容足以顛覆本書的基本觀點，但讓其缺席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如果書中能夠對相互矛盾的說法作更深入的探討，或許可以給讀者帶來更大的思考空間。

第三，如何理解抗戰時期中國鄉村的民族主義？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曾將中國農民的民族主義覺醒作為解釋中共崛起的決定性因素^⑲。但是，這種解釋忽略了農民與種種政治勢力之間複雜的、動態的博弈關係，如今恐怕已很難找到完全贊同的支持者^⑳。從此意義上而言，《鐵水流》的表述散發着一種復古氣息，尤其是本書的第三部分。例如作者寫道，「一般認為，中國農民知識文化水準普遍低下，民族意識較為淡薄，不過也不可一概而論」，並引用了作家沙汀與農民的一段對話：「『是怕日本兵吧？他們是隨便打罵中國人的。』『打都不要緊，怕喪命；他們又不懂咱話。』」作者就此推斷，「總體看，無論城鄉，民族情緒的確存在」(頁377)。筆者認為，這一史料主要體現了農民對日軍的恐懼，但恐

懼與民族意識的覺醒顯然還有較大距離。

在分析地道戰時，作者指出，「中共的有效引導、堅韌的武裝抵抗和一個對日充滿敵意的氛圍，是地道鬥爭開展的必要條件」（頁425），並在文中反覆強調民眾的對日敵意（頁430、437、451-52）。這種解釋與本書的其他分析在邏輯上有自相矛盾之處。例如作者提及，地道戰比較容易在中共的根據地內開展，但在中共無法控制的游擊區因「群眾生活不安定和政治上認識的不足」而較難開展（頁436）。作者在討論弱平衡時也指出某村莊的首領「遵循生存法則，跟日、國、共都保持平衡，這應該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頁410）。如此看來，相比於民族主義、對日敵意，從農民自私自利的心理，或者從血緣、宗族等鄉土倫理的角度來理解以上現象是不是更為恰當？

實際上，日本學者馬場毅在2021年也出版了一本分析山東抗日根據地興衰成敗的專著^②。根據其分析，抗戰初期，在既有地域秩序崩壞之背景下，出於鄉土防衛的動機，土匪、民團、槍會等地方武裝開始加入中共麾下，在民族主義驅使之下積極參加中共革命的主要是知識份子，而不是農民。因此該書對農民參軍的解釋是，中共在鄉村成功驅逐了其他政治力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控制權，並且其施政也較為符合民眾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支持中共對農民來說是最合理的、同時也是唯一的選擇。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恐怕是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在抗戰史這一研究領

域，因為中日雙方學者都有「當事人」的身份，所以更需要以一種冷靜的態度來謹慎對待。

第四，在歷史的長河中，如何理解、定位、評價中共在抗戰時期建立的革命系統？儘管作者聲稱「一些涉及價值評判的問題，先行擱置」（頁454），但縱觀全書可知，作者對中共的革命系統給予了高度肯定的評價。作者在結語部分寫道，「最大的感觸就是中共黨人的服從和皈依、運作系統的圓融有序、理論規範力和策略彈性的辯證統一，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的效率優先、政治統合和組織凝聚。這些形成為思維和運作系統，造成強大的慣性，使黨的意志幾乎無堅不摧」（頁453）。並且，作者在書中也流露出對中共革命系統的欣賞之情。例如，「本書面對的是一個鋼鐵般的政治力量的成長史。抗戰時期，一股巨大的洪流，像鐵水般，流出西北，流向華北，進而流向全中國。鐵水流，是的，鐵水流！」（〈引言〉，頁xxi）；「所有低估這個系統力量的人，過去、現在、將來，都可能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頁151）。

讀到這些文字，筆者手中捧着雖然是《鐵水流》，但又彷彿產生了一種正在讀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奇（Alexander Serafimovich）小說《鐵流》（*The Iron Flood*），或是周立波小說《鐵水奔流》的錯覺^③。這兩部左翼作品凸顯了革命者的鋼鐵意志、鬥爭的複雜性、社會的巨大變革，具有強烈的革命史觀色彩。儘管在選題、切入點、論證方法、細節刻畫、學術規範性等方面，

在選題、切入點、論證方法、細節刻畫、學術規範性等方面，《鐵水流》都與一般意義上的官史有很大的區別，但在論述框架的部分，本書非常接近革命史觀的主旋律。

就《鐵水流》而言，抗日戰爭只是作者選定的一個特定時代舞台，而中共的政治文化與組織運作系統才是問題指向，但這個問題並不是帶有完結性質的「歷史事件」，而是現在進行式的、帶有超時空意義的議題。

《鐵水流》都與一般意義上的官史有很大的區別，但不得不說在論述框架的部分，本書非常接近革命史觀的主旋律。

當然，如果將1949年前後的歷史進行切割，並且以革命戰爭的勝利作為唯一的評價尺度，那麼《鐵水流》的總體結論也能邏輯自治。但是，如果重視1949年前後的歷史連續性，那麼1949年以後給中國帶來巨大創傷的諸多歷史事件與抗戰時期的革命系統之間的關聯性就會浮出水面。就此意義上而言，「鐵水流」也可以被理解為，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卻沒有被正面解決，其後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成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河殤」。

如何定位歷史敘事的終點，是1949年？還是1976年？抑或是今天？這對評價抗戰時期的中共革命系統將產生重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中共黨史研究還有其特殊的一面。眾所周知，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已擁有逾一億名黨員，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換言之，中共並不是傳統意義上代表着「過去」的歷史研究對象，而是擁有超凡權力、延續至今、未來還可能產生變化的「活標本」。就《鐵水流》而言，抗日戰爭實際上只是作者選定的一個特定時代舞台，而中共的政治文化與組織運作系統才是問題指向，但這個問題並不是帶有完結性質的「歷史事件」，而是現在進行式的、帶有超時空意義的議題。

革命系統的歷史還未終結，歷史學者仍處在無法知曉故事結局的位置。可能正因為如此，通曉古今

的作者在全書的卷尾，以一種耐人尋味的筆調結束了《鐵水流》的寫作——「希望在高崗上，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遠在天邊」（頁456）。鐵水終將流向何處？這恐怕是所有讀者都需要掩卷沉思的終極命題。

註釋

①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劉統：《尋路：近代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00-192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李金錚：《重訪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1921-1949》（香港：開明書店，2021）；張永：《鍛造組織：紅軍與蘇區史新探（1927-1934）》（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23）；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著，閻宇、朱靈譯：《失序的造反：文革初期集體行動的內在機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何其亮著，萬芷均譯：《人民的西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自然與能動性（1949-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郝江東：《隱祕與偉大：東北抗聯後期鬥爭史（1938-1945）》（香港：開明書店，2024）等。

②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黃道炫、陳鐵健：《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③ 中共中央組織部信息管理中心編：《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資料彙編（1921-2000）》（內部發行，2002），頁1。

④ 高橋伸夫：〈黨、農村、兩性關係〉，載高橋伸夫編：《救國、動員、秩序——變革期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0），頁155-78。

⑤ 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頁3。

⑥⑬ 趙諾：《太行山上：中國共產黨太行根據地幹部政治成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頁422-23；373-92。

⑦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禮——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政治動員と民俗》（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255-56。

⑧ 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93。

⑨ 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齊小林：《當兵：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此外，關於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訓練改造以及統一戰線的地方實踐等問題，楊奎松也發表過數篇實證性學術論文，但本書亦未提及。參見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於抗戰爆發前後雙方在晉東南關係變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1期，頁4-39；〈敵後中共農村基層幹部隊伍的配備、選拔與規訓——以抗戰勝利前後中共山西太南農村基層幹部為例〉，《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4期，頁14-27。

⑩ 楊奎松：〈抗日戰爭研究理應重視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頁22-25。

⑪ 日本學界的戰爭史研究，詳見波多野澄雄：〈日本における日中戦争史研究について〉，《外交史料館報》，第31卷（2018年3月），頁37-60。台灣學界的成果，參見蘇聖雄：〈從軍方到學界：抗戰軍事史研究在台灣〉，《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1期，頁141-57。

⑫ 岳謙厚：〈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13, issue 2 (2016): 173-206；陳永發：〈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

器〉，《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8年8月號，頁43-71。

⑬ 楊奎松：〈毛澤東為甚麼要寫《論持久戰》〉，《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頁20-33。

⑭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⑮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Cleveland, OH: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474.

⑯ 黃道炫：〈傾聽靜默的聲音〉，《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5期，頁27-31。

⑰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上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73、600-601；下卷，頁110、353、293、563。

⑱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⑲ 例如，日本學者石島紀之在幼年曾經歷過戰時的東京大空襲，這孕育了他的反戰思想，也使得他同情中共革命。但即便是石島紀之這樣在情感上偏向中共的老派學者，在晚年也對中國農民的民族覺醒一說持保留態度。詳見石島紀之：《中國民眾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え、社會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研文出版，2014）。

⑳ 馬場毅：《日中戦争と中國の抗戦——山東抗日根據地を中心に》（福岡：集廣舎，2021），頁422-32。

㉑ 綏拉菲摩維支 (Alexander Serafimovich) 著，曹靖華譯：《鐵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周立波：《鐵水奔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